

中国经济学七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史晋川 叶建亮

自经济学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济民”实用主义烙印就始终伴随着其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总体上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完善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这两大主题展开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经历了不断的反思、发展、创新和丰富，努力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方向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建设及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主线，经济学在中国经历了一次大的发展。在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学界除了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性质和经济成分外，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解读和全面学习引进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理论，来论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合理性、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问题，同时也围绕着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进行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全盘接受了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把苏联的经济学理论

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中被奉为圭臬，其他现代经济学理论均被视作“理论异端”加以批判，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学进入了“苏联范式”全面主导的理论发展阶段。

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大跃进”受挫和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显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理论反思阶段。毛泽东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倡导重读马列经典，反对教条主义，检讨经济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方针。以孙冶方、薛暮桥、卓炯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在基本上未触及社会主义全民与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同所有制及经济成分的关系、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及价值规律的作用和按劳分配问题。孙冶方先生对价值规律的研究促进了人们对计划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再认识；卓炯先生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同所有制的存在与商品交换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认识；薛暮桥先生对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研究，发展出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加深了人们对计划经济中社会再生产活动规律的认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不仅初步地反思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际运行中所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僵化教条的“苏联范式”

政治经济学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全面停滞和倒退，经济学完全沦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附庸。在“极左”思想路线支配下，除了宣传“一大二公”，按劳分配理论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加以批判，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学教育完全停摆。但是即便在这样严峻的社会环境下，仍有老一辈经济学家在坚持对真理的探索，独立、系统和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顾准先生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反思、许涤新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于光远先生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分配问题的研究等。这些经济学理论探索，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解放及经济理论的全面反思，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部分的理论储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也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理论繁荣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服务经济建设中心，不断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胆借鉴、转变范式、勇于创新、积极探索，遵循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开展了全方位探讨和深入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学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经济总量“翻两番”等经济发展重大战略问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中国经济学界在七十年代末解放思想，突破禁锢，开展了价值规律问题的大讨论，带动了经济学界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反思，极大地凝聚了改革开放的共识。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开始把研究视野拓展到了对计划经济体制先行探索改革的东欧各国，积极引进东欧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学习东欧各国的改革理论和实践经验。中国经济学不断突破“苏联范式”的束缚，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突破，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全国大专院校经济学专业陆续恢复和创设，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为满足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大量引进消化和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一批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借鉴和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部门经济学的学科也不断地发展起来。

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及改革全面推开的背景下，八十年代中期召开的“莫干山会议”和“巴山轮会议”，成为了中国经济学发展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两次重要会议。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以中青年经济学家为主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就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尤其是价格改革问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双轨制”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建议和意见，打开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思路。1985 在重庆“巴山”号邮轮上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则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会的国内外经济学家通过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研究，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开展了深入的探讨，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提供了经济理论依据。八十年代中期后，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学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从改革开放初学习东欧的经济理论和改革经验，到开始把目光更多地直接投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加快了学习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步伐。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再仅局限于探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部改革和完善，而是开始思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问题。更多学者在经济研究中系统地学习和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数量化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战略问题开展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改革整体协调推进方案、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乡镇企业发展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与微观经济基础重塑、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及价格体制改革等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大批非常有价值的成果。这一时期中，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经济研究从注重理

论演绎的定性研究开始转向以现实问题为主的实证经验研究，经济研究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的解释能力和指导作用大大增强，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高潮，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中国经济学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中国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党和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扫却了在经济学研究中“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羁绊，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大胆地学习和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更为广泛深入地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主题，在经济研究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体系建设与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构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改革、财政制度改革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涌现了大量的优秀研究成果，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及“两个毫不动摇”的写入《宪法》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一时期，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经济开放进程的加快，全球化和开放经济也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学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安全问

题、开放经济中的国际产业分工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与招商引资问题等。这些经济研究成果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迅速形成开放经济的新格局，促进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的提升，以及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地位，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尤其是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后，经济学界开始深入反思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和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模式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病，积极探讨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通过高质量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加快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等一系列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同时，也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建设、区域的协调发展、城市化和城乡统筹、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围绕着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和新的发展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此外，中国经济学家结合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基本国情，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新问题，对经济发展中的成果共享和公平性问题，对市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市场准入和产业政策问题、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交通通讯水电气等公共事业治理等问题，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期。

中国经济学七十年来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得益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的改革和经济研究人才的培养，也得益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积极开放、兼容并包及与国际学术研究的接轨。

展望中国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在中国经济发展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同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进入攻坚期和转型期。如何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更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为中国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也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中国经济学正面临着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学界正以昂首向上的姿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吸收现代经济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和先进的分析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

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丰富和增强中国经济学在全球经济体系治理中的话语权，朝着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方向大步前进。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